

辜胜阻◎著

转型时代的 与 创业 创新



人
民
出
版
社

辜胜阻◎著

转型时代的 创业 与 创新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代的创业与创新/辜胜阻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

ISBN 978-7-01-017411-2

I. ①转… II. ①辜… III. ①企业管理 IV. ①F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400 号

转型时代的创业与创新

ZHUANXING SHIDAI DE CHUANGYE YU CHUANGXIN

辜胜阻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5

字数:452 千字

ISBN 978-7-01-017411-2 定价:7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辜胜阻，男，湖北武汉人，195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学部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评审专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与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创新经济学与金融创新。

辜胜阻教授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赴国外留学和研修的学者，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留学人员”称号。他1986年至1988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进修硕士学位课程；1989年至1990年任日本国日本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至1993年任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教授；1994年任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至1997年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在美进行合作研究和讲学，1998年后多次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



辜胜阻教授是政学相长的学者型官员，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学术活动以来，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其他部省级科研项目数十项；在国家级报刊和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数十部。并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和奖项：1991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1992年被评选为第三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1994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5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并获教育部优秀成果特等奖，199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工程”，1998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十余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作为学者型官员，他自1998年从政以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每年都结合自己的分管工作，深入企业、城乡社区、学校、全国各类开发园区和海内外城市进行考察调研，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依托其学术研究成果，他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为平台，围绕国家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立论，提出百余项政策建议，许多政策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

序 言

创业创新是经济转型的最大新动能

一、创业创新是中国版供给经济学理论和结构改革的伟大实践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明确它有“三大任务”: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改革引领。习近平总书记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创新。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三大主体”,发挥人的积极性。实现改革的落地,要激发市场主体——企业家,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改革主体——官员,这三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振企业家精神,激活科研人员创新精神和官员的担当敬业精神。再次,要防范认识上的“三大误区”,不能把供给和需求对立或割裂开来,供给和需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增加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产能,应该是上述“三大任务”的统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三大引擎”,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中国制造 2025”,加速推动产业的升级;二是创业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三是“一带一路”,通过开放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有四次大的创业浪潮:第一次是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以体制内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精英创业”,包括了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的行政科研人员,当时有大量体制

内的政治精英、科技精英下海经商；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创业浪潮；第四次就是当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这一轮创业浪潮具有六大重要特征：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的改革成为创业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创业、创新、创富形成“金三角”，创业主体为创富而创业，为创业而创新；创业创新主体多元化，不仅有精英创业，也有草根创业；创业创新的形式高度互联网化；在创业创新中，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创业创新载体呈聚合式创业创新，全国出现多个创业创新中心。

二、通过创业创新培育新动能，需要营造良好创业生态，打造创业—创新—创富“金三角”和创业—创新—创投“铁三角”，实现聚合创新，要依靠大企业“裂变式”创业，建立容错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让创业创新者有“安全感”

一要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推进创业创新的主体多元化。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创业主体、创业要素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构成的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实现创业主体多元化，要重视三类“回归”创业，推进草根创业与精英创业共同发展。当前，创业不仅有“洋海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还有“农海归”（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在金融危机后，湖北黄冈有2000多农民工回乡创业，吸纳8万多人就业。此外，还包括成功人士回归家乡创业，如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进浙商回归创业。

二要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和营造良好环境，推进创新人才的知识资本化和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建立知识合法转化为财富的机制，实现创新、创业、创富联动，形成创新“金三角”。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因此，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

三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打造创业、创新和创投“铁三角”。美国私募基金规模超过中国10倍，国内创投发展与国外差距较大，要

通过大力发展创投鼓励更多的闲钱进入实体经济。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和法治化,要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进一步治理资本市场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市场生态。要用好“新三板”,服务创新型中小微企业。

四要推进模式创新,实现众创、众包和众筹的有效对接,推进创业创新要素聚合。要通过科技园引领新一轮要素聚合,中关村就是典型的要素聚合创新载体,具有产、学、研、用、金、介、政齐备的协同创新体系,能够吸引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资源集聚。深圳是全国创新最成功的城市,其成功原因在于深圳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有利于孕育“敢于冒险、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创新精神;形成了多元化创新创业主体的“新四军”,有海外留学归来创业的“海归系”,有从全国各地到深圳创富的“孔雀系”,此外还有由深圳本地创业者形成的“深商系”和从科技大企业离职创业的“裂变系”。深圳有极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圈,形成了创业、创新、创投“铁三角”,实现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五要发挥科技大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龙头”作用,推进“裂变式”创新创业,形成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李克强总理讲,“双创”既是小微企业生存之路,又是大企业繁荣兴盛之道。大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能力强,研发能力高,是新创企业的“黄埔军校”,目前市场上裂变出了联想系、百度系、腾讯系、华为系等创业者群体。

六要建立容错机制,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业文化和价值观。创业创新面临着多重风险,需要建立容错机制为创新者保驾护航,消除创新者的后顾之忧。创业文化是创业创新活动最根本的支撑,也是继续推进创业浪潮的重要保障。要注重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文化层面提升社会对创业者的认可和尊重。

七要完善产权保护机制,让创新创业创富者有“方向感”和“安全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促进创业创新非常重要。要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倡导政府诚实守信,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使创新创业创富者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开展创业创新。

八要避免创业创新过程中的“浮躁化”心态,防止创新“运动化”和盲目跟风倾向,避免创业“泡沫化”和过度炒作行为,纠正对创业创新“全民化”的误解,众创关键在众,但众创不是全民创业,防止“互联网+”创业的过度“网络虚拟化”以及创业教育“功利化”。通过避免误区和误导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创业创新是经济转型最大的新动能,是中国版供给经济学的成功实践。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对冲经济下行产生的就业风险,通过创新实现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

一方面,创业对于保障就业是“快变量”,大量新增市场主体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应对当前失业风险的重要举措。从世界范围看,为了应对失业危机,美国提出了创业美国,英国鼓励大众创新,日本也提出要鼓励创业。统计显示,日本平均每年新创办的企业为9万家。而我国每天新创企业就有1.4万户,一周新创企业数量相当于日本一年的总和。伴随着大众创业浪潮的不断推进,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稳定在5%左右。另一方面,通过万众创新,创造新需求,实现新供给,培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据统计,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发明专利增长44%,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已超过GDP的15%。同时,创业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通过创业与创新的联动,将使技术创新等成果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未来,为了更好地发挥创业创新作为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作用,政府要进一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让初创企业不仅要“生得快”,更要“活得好”,“活得长”。

我对创业创新问题的研究始于1997年,当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对创业创新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2005年),以主管的科技园区和高技术产业化政府工作为依托研究创业创新。1997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我从美国返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大会。开会期间,我

作为民建中央常委,拜会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先生。成先生告诉我正准备在1998年“两会”期间提出关于推进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大会提案,希望我利用在哈佛访学的机会,对风险投资进行研究并对美国风险投资的现状进行实地考察。从北京回到波士顿后,我对风险投资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得知美国风险投资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美国“风险投资之父”是前哈佛商学院助理院长 Georges Doriot,但风险投资大发展则在西部的硅谷,美国风险投资的一半以上在硅谷。随后,我又实地考察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也是创业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对美国的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搜集了许多一手资料。访学回国后,1997年9月,适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举办的“创业投资与资产证券化”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提交了论文《美国的风险投资与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对策》。于是,对风险投资的研究便成了我研究高技术产业与创业创新的切入点。我于1998年初出任武汉市副市长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两会”的一号提案是民建中央的风险投资提案。我作为民建会员和政协委员参与了一号提案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而且有幸参加了当年“两会”期间的风险投资一号提案现场办案会。在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工作的8年时间内,我一直分管创业创新载体——高新技术开发区。政府工作不仅使我有机会对全国的高新区进行调研,而且我也利用出访机会对主要国家的科技园区进行实地考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曾先后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发展,借鉴各地区创业创新发展的宝贵经验。多次到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成都、西安等地实地考察高新技术产业与创业创新发展。对国内外的大量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以及与企业、科学家、政府官员面对面地探讨,让我对高技术产业和创业创新的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第二阶段(2005—2012年),从民营经济与科技创新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视角研究企业为主体的创业创新。这一阶段,我调任北京,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全国性群团——全国工商联和以联系非公经济为特色的参政党——民建中央工作。所以,我更多侧重于民营+科技为特色的创新主体——民营科技企业创业创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所带来的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困境,连续多年深入全国数十个省市数

百家民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创新与转型升级的科研论文和调研报告。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转型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视角研究创业创新。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和经济转型,后来中央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阶段,我的研究侧重从创新驱动战略和经济转型视角开展研究。最近几年来,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正蓬勃开展,我对北京、深圳、上海、天津、武汉、成都、西安等20多个城市数百家企业和创业创新平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新常态下创业创新出现的新特点及推进创业创新发展的新战略,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考与对策建议。

20年来,我持续关注并从不同角度研究创业创新问题,将学术研究与参政议政结合起来,将政府工作与理论研究联系起来,力图丰富创业创新的相关理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围绕创业创新问题,我们出版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2013)、《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战略转型》(2011)、《民营经济与创新战略探索》(2009)、《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探索》(2008)、《民营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2005)、《高技术产业经济研究》(2003)、《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化》(2002)、《新经济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2000)、《政府与风险投资》(2000)等专著。组织并参与了一批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术活动。我每年都出席民建中央和科技部联合举办的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并做主题演讲,并围绕创业创新到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作了数百场学术报告。承担了一批创业创新的国家重大项目。我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技术企业区域发展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高新区发展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等与创业创新直接相关的国家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先后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管理世界》《求是》《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等报纸、期刊。指导培养了一批专注于创业创新研究的经济学博士及博士后。就创业创新的相关问题建言献策,提出了一批影响国家决策的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例如:《进一步推进双创健康发展,推进经济转型升级》(2016)、《规范发展股权众筹,支持创业创新》(2016)、《推进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引领新常态》(2015)、《创新是国家强盛的基石》(2007)、《加强自主创新,实现高技术开

发区的二次创业》(2005)等数十项促进创业创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本书汇集了20年来我对创业创新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调研报告,时间跨度正好反映了我对此问题的调查研究轨迹。

辜胜阻

2017年1月

目 录

上 篇

1 构建服务实体经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	3
2 推进“双创”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思考	22
3 规范发展股权众筹 支持创业创新的战略思考	30
4 供给侧改革需加快推进国企创新驱动战略	41
5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思考	53
6 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浪潮特点与趋势	64
7 让“互联网+”行动计划引领新一轮创业浪潮	73
8 以互联网创业引领新型城镇化	83
9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激发多元主体活力	102
10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109
11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亟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121
12 推进企业创新亟须重构创业板制度安排	136
13 创业创新引领新常态	152
14 构建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的创新机制	157
15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方向与新动力	171

16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创新驱动”	186
17	扶持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思考	198
18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208
19	扶持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意义与实施对策	220
20	区域经济文化内涵及对区域创新模式的影响机制	236
21	完善国家创业政策体系的意义与对策	247
22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面临的动力机制困境和制度创新	261
23	国家创新体系要汇集政府和民间两股力量	274
24	推进“大学—产业”互动,重构创新文化价值体系	280
25	区域创业文化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295
26	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306
27	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生力军	320
28	区域经济文化对创新模式影响的比较分析	326
29	论高技术产业的机制创新	341
30	高技术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战略思考	351
31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	357

下 篇

32	发挥国企在创新发展中的骨干作用	369
33	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科学航标	372
34	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的六大特征	377
35	新一轮创业潮是城镇化新引擎	382
36	创业创新和“一带一路”对冲经济下行风险	386

37	让创业创新成为引领新常态的新引擎	391
38	有创新驱动,才能击水中流	395
39	当前 VC/PE 行业深度调整的方向	397
40	让股权激励为企业自主创新插上腾飞翅膀	401
41	壮大新兴产业需要完备高效的投融资体系	405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技术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	410
43	积极引导新一轮创业浪潮	415
44	新社会阶层要以强国富民为己任	419
45	创新型国家需要健全的区域创新体系	426
46	企业创新是国家强盛的基石	430
47	更加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434
48	六大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438
49	硅谷精神与制度创新	441
50	发展知识经济必须抢占高技术产业制高点	455

上 篇





构建服务实体经济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股市波动而改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构建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有利于拓宽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渠道、优化实体经济融资结构、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透明、开放、流动性好、发达的资本市场是我国建设大国金融的核心元素。

2014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逐渐回暖,上证指数从2000点左右一路上涨至4000多点,并一度突破了5000点大关,成交额同步大幅攀升。2015年截至5月29日,上证所A股总成交金额达570148亿元,已超过了2014年全年成交金额。但此轮股市行情暴涨与暴跌交替上演,自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上证指数自5000多点跌至3000多点,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跌幅达1600多点,市场整体震荡严重。

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高监管能力,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现实命题。